

社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及展望

The Status Quo and Prospect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China

刘佳燕

摘要: 本文就社会影响评价相对于环境影响评价而言在我国发展的相对滞后状况, 提出当前发展的重要时代意义, 并探讨关于其范式界定、评价变量选择以及和公众参与的关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最后提出社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未来发展展望。

Abstract: With a view of the lag of development of SIA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relative to EI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brings forward the significance of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IA, and discusses some specific problems about its appropriate paradigm, assessment variables, and relationship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etc. Finally, the p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IA in China is proposed.

关键词: 社会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 社会影响

Keywords: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ocial Impact

1 从环评看社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积累, 我国在环境影响评价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 包括评价范围、原则、程序、方法和技术等。在2002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 明确要求对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 区域、流域、海域开发利用规划, 以及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能源、水利、交通、城市建设、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等10类专项规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由此, 不但将环境影响评价上升到法律高度, 而且首次将规划环评纳入评价范围, 并赋予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被誉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重大完善(潘岳, 2005)。

然而, 审视整个环评法中, 尚无“社会影响”的内容, 有关社会部分的内容也仅限于对公共参与的程序性要求。可以说, 与当前逐步完善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比, 社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所受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法律保障、评价标准和方法, 以及专业化的管理、评价机构都较为缺乏(王朝刚, 李开孟, 2004; 伍跃辉, 2005)。而且, 目前国际上社会影响评价的发展重点已逐步向战略评价环节转移, 强调从整个决策链(战略、政策、规划、计划、项目)的源头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Bulmer, 1983; Burdige, Vanclay, 1995; Becker, 1997), 而我国绝大部分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都还集中于项目评价。

2 社会影响评价的发展意义

回顾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和建设项目中, 长期以来以财务和经济评价为主, 很少关注社会层面的影响, 即使可能出现整个邻里社区的迁移、传统社会网络的摧毁等将对当地居民生活和工作方式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 普遍观点也是认为项目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可以弥补这些影响, 而不论这些经济效益中有多少是真正为受损群体所享有。或者, 即使开展了所谓的社会影响评价, 也以技术经济范式下的社会效益分析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更多体现为经济评价的“附属品”(朱东恺, 2004), 并且往往容易受到传统投融资体制下审批制度的影响, 出现虚设、夸大社会效益, 以增加项目“可行性”和“可批性”的现象(王朝刚, 李开孟, 2004)。

随着当前政府职能转化和投资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 政府对于投资和建设的关注

作者: 刘佳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与设计系, 博士研究生。
liujiayan97@mails.tsinghua.edu.cn

重心开始逐步集中于公共投资(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规划和基础性项目)以及涉及重大经济、社会、生态影响的私人投资项目,主要从维护经济安全,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优化重大布局,保障公共利益,防止出现垄断等方面进行核准^[1]。这些重大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由于涉及对地方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社会风俗等具有“公共产权”性质资源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往往对当地甚至更广泛区域的社会形成重大影响(例如奥运会或博览会的场址规划,将可能对整个举办城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持续数十年的影响^[2]);另一方面,当前不断凸现的拆迁移民等社会问题也显示,一项规划或建设活动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当地社会文化环境适应和接受程度的制约。

可见,面向当前我国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进程,通过预测、评价项目与当地社会人文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适应程度,将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对社会因素的关注纳入决策过程,指导提出更加科学合理及社会可接受的建议,将有助于提高决策质量,尽早预防、避免或缓解消极的社会影响或社会问题,并为项目地区的人口提供更为广阔和可持续发展机遇。

推动社会影响评价机制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对建设项目本身的重大意义,如保障项目与所处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从而提高项目整体效益,促进项目评价与国际接轨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吸引外资等(塞尼,1997;王朝刚,李开孟,2004);更重要的是,从城市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完善政府职能具有显著的时代意义。

落实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战略

二战后至今,全球社会发展观经历了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为核心、再到当前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全面协调的综合发展观的演变历程(袁方,1995)。社会影响评价强调将全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原则纳入干预行动的决策过程,成为落实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指导实践干预活动的有机联系。

强化政府对公共社会事务的宏观调控职能

随着当前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对投资项目的管理重点从市场前景及项目盈利能力等属于企业自主决策的问题,转移到项目的公共性、外部性等问题(孔令龙,2004)。政府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需要分析监控项目对各利益相关群体的间接和直接、短期和长期、有形和无形、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保障成本和效益分配中的社会公正原则。

提升在干预行动决策阶段预防和缓解城市社会问题的重要职责

面对城市开发建设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冲突,仅仅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救性措施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且项目施工阶段的执行主体是房地产开发商、拆迁公司等经济实体,必然以营利为目标,因而需要从干预行动的源头入手,即在项目规划和立项等政府决策阶段,通过社会影响评价予以关注,并提出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措施。

3 社会影响评价研究中的具体问题

3.1 社会影响评价的范式界定

上述发展背景对于开展全面社会影响评价的要求,是单纯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的评价方法难以胜任的。目前国际上普遍推行的是一种基于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的评价方法,它主要在1970年代以后得到迅速发展,并已被美国、欧盟以及大多数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广泛应用于社会影响评价领域,也被视为当前我国社会影响评价发展的主要参考模式(社会评价课题组,1997;向清,1997;王朝刚,李开孟,2004)。

这种社会学范式的评价方法应用于不同国家和机构的评价工作中,又拥有不同的称谓和存在一定差异的内涵,例如常见于美国的“社会影响评价”(Social Impact Assessment),英国的“社会分析”(Social Analysis),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社会评价”(Social Assessment)(向清,1997)。笔者认为,尽管称谓不同,但其核心内容都是强调通过识别、监测和评价所规划干预行动(政策、计划、规划、项目)带来的各种有意或无意、积极或消极的社会影响及社会变化过程,促进利益相关者对于干预行动的有效参与,从而优化行动实施方案,规避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IAIA,2003;王朝刚,李开孟,2004),因而相对于前一范式,可统称为广义的社会评价(向清,1997;徐莉,柳瑞禹,1999)。

上述概念的差异主要源于各国和机构发展社会影响评价的制度和背景的不同。例如,美国的社会影响评价最早以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令(NEPA)的规定作为环境影响评价的组成部分,后来才逐步推广并独立应用于水资源开发、城市建设、土地资源管理、对外援助等项目中,因而社会涵义较为广泛,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社会福利、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通常需要多学科专家的协同合作(ICGP,1994);而社会评价作为世界

[1]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发[2004]20号文件

[2] 根据国际奥委会OGGI(Olympic Games Global Impact)评估项目的要求,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每个奥运会主办城市都要在奥运会结束后两年内提交OGGI评估报告。目前,我国正在开展对于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影响评价工作,并于2005年9月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初始报告;同期,英国普华永道公司(PwC)受英国文化部和伦敦开发署委任,完成关于伦敦2012年奥运会的《奥运影响研究》报告。上述报告中,社会影响评价都作为独立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价和监测时间跨度达十余年。参见:郝航生. 奥运理念的发展和奥运会总体影响研究. 人文奥运网, 2004-07-12. <http://www.c2008.org/index.asp>; PriceWaterhouse Coopers. Olympic games impact study (final report). December 2005. <http://www.culture.gov.uk>

银行等国际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分析项目对受影响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对项目实施和达到预期目标的作用，最终意图在于缓解外来投资项目的技术内容和管理方式与发展中国家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较大反差(社会评价课题组，1997)。

因此，探讨社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发展，具体借鉴上述何种称谓的类型模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需要结合我国特定国情和规划体制背景，制定适宜的评价方法。

3.2 社会影响评价变量的界定

“社会影响”作为社会影响评价的对象，是指任何公共或私人行为的后果，带来人们生活、工作、游憩活动中相互关系和组织协作方式的改变，以及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如规范、价值观、信仰的改变，从而指导他们对自我和社会认知的形成，并使其合理化(ICGP,1994)。一般广泛涉及对审美、考古、社区、文化、人口、经济、性别、健康、原住民、基础设施、制度、政治、贫困、心理、资源等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Vanclay,1999a)。

关于社会影响的评价变量和指标体系，各国学者和机构都已拥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影响评价指导方针和原则国际组织委员会(ICGP: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Committee on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1994)提出5大类共32项社会影响评价变量。

(1) 人口特征——包括人口规模、密度和变化；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分布状态；移民；流动人口；季节性居民；

(2) 社区和制度化的结构体系——志愿组织；社团活动；地方政府的规模和结构；变化历程；就业/收入特征；弱势群体的公平的就业权利；地方/区域/国家的联系；产业/商业的多样性；规划和区划活动；

(3) 政治和社会资源——权利和权威的分配；新移民和原住民的冲突；资金的证明/鉴定；感兴趣和受影响的政党；领导能力和特征；国际组织的合作；

(4) 社区和家庭的变化——对风险、健康和安全的感知；对迁移和拆迁的关注；对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信任；居住的稳定性；相识的密度；对政策/工程的态度；家庭和友谊网络；对社会福利的关注；

(5) 社区资源——社区基础设施的改变；本地人口；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对文化、历史、宗教和考古学资源的影响。

其他还有如Taylor等人(1990)提出的4类变量(人口变化；生活方式；态度、信仰和价值观；社会组织)，Burdge(1994)提出的5类变量(人口影响、社区和机构安排、地方居民与新移民的冲突、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影响、社区基础设施需求)，以及影响评价国际协会(IAIA,2003)总结的8类变量(人们的生活方式、文

化、社区、政治系统、环境、健康和福利、个人和财产权利、担心和期望)等。

针对国内不同的行业领域和规划建设项目，应在借鉴国内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探讨适宜的变量研究体系。尤其需要注意以下主要问题。

指标选择应基于地方特点并贯穿评价的全过程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仅仅依靠事前的、外来的“专家判断”，而不是去理解一个正确的研究过程，这种忽视特定社会文化背景和当地公众选择的决定几乎是不可行的(Burdge, Vanclay,1995)。正如上述各项指标体系的提出者，在其列表之后都坦然提出不可能详尽列出社会影响的所有变量指标——考虑到社会影响是作为不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历史背景以及项目场景下的特定产物。而且，各专项规划普遍具有很强的行业特色，需要考虑的指标范围也难以统一。因此，指标的选择和界定需要贯穿于整个评价过程，并随着对项目环境认知的逐步深入而不断调整完善。

区分社会变化和社会影响

基于影响价值链的分析可见(见图1)，评价中所关注的社会影响并非包括所有的变化结果(即图中的“产出”)，而仅指“受规划活动作用的、将对目标对象产生影响的结果”(ICGP,1995; Vanclay,1999b)。而很多评价体系中的指标都是描述社会变化过程的变量，其实并不能作为社会影响的完全表征。例如，在大部分评价指标体系中都把人口的增加、临时性工人的出现等作为社会影响的评价指标，但它们其实都不能作为社会影响的评价指标，因为只有特定的背景下，它们才可能导致住房短缺、社区社会结构分裂等特殊影响。因此，这些描述社会变化过程的要素，依赖于研究对象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如果控制得当，影响可能不会存在。

区分有/无规划状态下的社会影响

根据影响价值链中社会影响的另一个特征(即“受规划活动作用”)，需要清晰区分规划与非规划活动作用下的社会影响。任何社会对象都始终处于与周边环境互动变化的过程中，因而影响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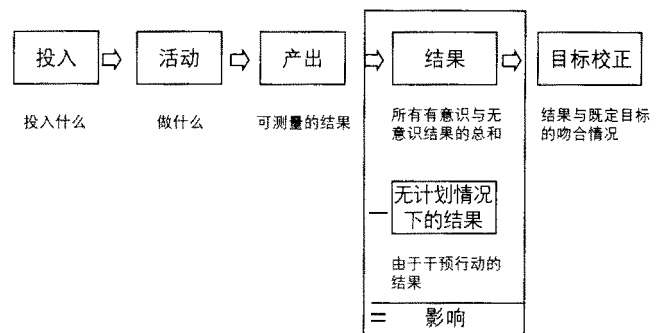


图1 影响价值链
资料来源: Clark 等, 2003

成的原因既包括规划活动,也可能包括其他因素,例如,由于更广泛区域背景的变化(如宏观经济增长或政策调整带来人们福利水平的普遍提升)或周边地区的发展(如邻近地区大规模办公设施的入驻,带来当地设施服务的短缺)所带来的影响,需要与规划项目自身所带来的影响有所甄别。

明确简单统一的评价准则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往往不可避免地需要一个较为庞大的、面面俱到的评价变量和指标体系。但应认识到,评价工作的最终任务是明确提出主要的潜在影响和修正意见,因而,对于那些通常缺乏统一量化标准的社会影响变量,需要确定一个简单适用而又能实现综合统一的评价准则。参考世界银行和Branch等(1997)提出的评价标准,对于规划或建设项目社会影响的最终评价,建议缩减为几个简洁的核心问题(见表1),如项目是否公正?是否可持续?与地方的互适性如何?

3.3 社会影响评价与公众参与

当前,国际上社会影响评价的发展趋势是从原来的专家决策转化为一种大众影响决策的社会参与过程(Creighton, 1983; Yankelovich, 1991; Becker等, 2003; 于晓刚, 2005)。公众参与应贯穿社会影响评价的全过程,并广泛吸纳各利益相关的社会群体、组织和个人,包括社会影响评价工作人员、行政管理人

表1 社会影响评价的基本评价准则

| | |
|---------|----------------------------------------------------------------------------------------------------------------------------------------------------------------------------------------------------------------------------------------------------------------------------------------|
| 社会公正原则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公正原则: 确保项目实施不会加剧地区或群体间的不平等现象,尤其关注儿童、失业群体等弱势群体; ◆ 成本负担: 社会成本应被视为干预成本的一部分; ◆ 效益获取: 确保项目收益确实为目标受益人获取; ◆ 补偿原则: 探讨各种可行的规划方案,尽可能避免或减少群体利益受损;如果影响不可避免,则尽可能使受损群体能分享项目效益;应全面考虑缓解影响的各种可能措施,即使受影响群体赞成规划行动,或被视为受益者; |
| 社会可持续原则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多样性原则: 充分认识和尽可能保护地方社会、经济和文化等特征的多样性; ◆ 预防原则: 尽可能通过修正规划方案避免影响的产生,如果影响不可避免,应探讨可持续的缓解措施; ◆ 优化原则: 社会影响评价应不仅限于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成本之间的仲裁手段,还应有助于决策最优的发展方案; ◆ 协作原则: 强调多部门间的协商与合作; |
| 互适性原则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社会学习: 在规划方案制定和影响评价中,都需要充分考虑并尊重地方性知识、经历和文化价值观; ◆ 民主原则: 应充分考虑社会群体对项目的意愿和接受程度,任何侵犯社会群体人权的手段和过程都不可接受; ◆ 公众参与: 规划行动的决策应尽可能接近各类利益相关群体。 |

员、规划制定人员、相关专业专家、受影响群体、非政府组织、开发商(建设者)、资金商以及发展机构(如国际援助组织)等。

这种参与式的社会影响评价,尊重并承认受影响群体对他们亲身所受影响进行评价的权威性,将有效促进评价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其基础就是要求规划、评价与管理人员真正参与到与当地群体的对话、协商中(Yankelovich, 1991)。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强调评价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但两者并非等同(Creighton, 1983)。例如,公众参与的组织者与社会影响评价人员所关注的重心往往存在差异,前者多关注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和政治权力,而后者则更关注社会整体,因而,参与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并不能全面作为社会意见的真实代表。所以,公众参与应作为贯穿评价过程的重要环节和保障信息沟通的有效手段,评价人员需要站在推进整个项目顺利进行的更高视野,而决不能以参与为全部。这也意味着,公众参与并不能作为社会影响评价的完全代表。

4 未来发展展望

影响评价国际协会(IAIA, 2003)在其报告中特别强调,一个好的社会影响评价,需要认识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各项影响之间的内在紧密联系,任何领域的变化都可能引发其他领域的变化。因此,尤其在大规模的规划项目中,建议实现社会影响评价与其他影响评价的协同开展。

其他相关的影响评价,包括经济影响评价(Economic Impact Assessment)、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风险和灾害评价(Risk and Hazard Assessment)、技术评价(Technology Assessment)、健康影响评价(Health Impact Assessment)、文化影响评价(Cultural Impact Assessment)等。

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社会影响评价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结合,即环境社会影响评价(ESIA)。例如,在最早明确环评法律地位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令(NEPA, 1969),以及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考虑环境与社会影响指导大纲》(2004)中,都提出需要评价的人类环境既包括大气、水、土壤、生态系统等“自然和物质环境”,也包括美学、历史、文化、健康等层面的“社会人文环境”。

不过,在具体操作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评估主体的资格确认问题。环境影响评价与社会影响评价所需要的专业理论和方法差异较大,是否需要不同的专业团队分别开展评价?其次,由于社会因素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量化的特点,带来评价标准的界定问题。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可以通过设定阈值而行使一票否决权,而对于地方差异性较大的社会影响应如何设定规范或否决标准?环境与社会(甚至与经济)层面的效益或影响之间如何设立比较权重?在绝大多数国家,最终往往是以环境影响的程度作为是否开展深入评价或行使否决权的判断标准,从而导致社会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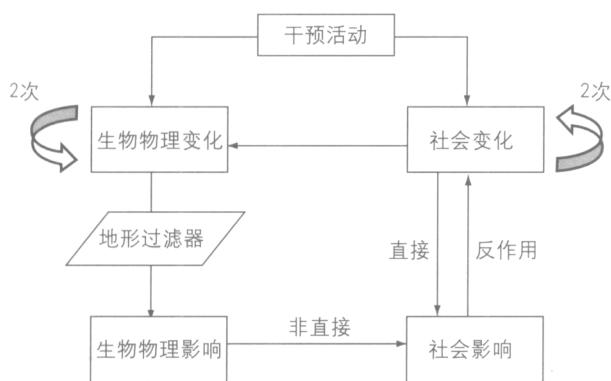


图2 生物物理和社会影响的相互联系

资料来源: Slootweg, van Schooten, Vanclay, 1999

评价退缩为环评的构成内容, 在评价质量和影响效力上都相对不甚理想(Momtaaz, 2005)。其中, 往往存在一个认识误区, 即仅将社会影响作为生物物理系统影响的一个过程要素, 而忽视其与之对等的重要地位和连锁作用(见图2)。

因此, 1980年代以后, 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社会影响评价逐渐独立于环境影响评价。现在的发展重点由项目评价(project assessment)转向战略评价(strategic assessment)(Becker, 1997)。

此外, 还有人试图将社会和经济影响评价相结合(SEIA), 但事实显示存在相当难度,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令(NEPA)中亦提出这两部分截然不同(Barrow, 2000)。近年来, 健康影响评价和文化影响评价逐步兴起, 可以视为社会影响评价中的领域拓展, 也经常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

由此看来, 要实现社会影响评价与其他影响评价的整合, 尚需要在制度和技術上的进一步探索。针对我国的特定情况, 可以考虑先采用环境社会影响评价的形式, 或在现有环境影响评价中增加社会因素评价作为组成部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和总结, 待社会影响评价的方法、指标和评价主体逐步发展成熟和完善后, 再形成独立的社会影响评价体系、评估制度和审核主体。

至于在具体实践工作中, 对于各项影响评价之间合作方式的选择, 需要根据现有法规、资源、技术和能力等条件加以权衡:

- 根据法律、规范、契约或资金的要求。如果各要求之间出现冲突, 则需要和所有利益相关群体协商决定;
- 根据快速社评中所界定社会问题的范围和复杂程度。如果拥有较大范围和较高复杂度, 则需要独立的社会影响评价;
- 当各项评价活动进度难以取得一致, 或技术整合、统一领导等协调力量尚不完善和成熟的时候, 建议采取多团队协作的形式。

参考文献

Barrow C J.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rnold, 2000.

Becker H A.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 and experience in Europe, North American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London: UCL Press, 1997.

Becker D R, Harris C C, Mclaughlin W J, etc. A participatory approach to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the interactive community forum.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03(23): 367-382.

Branch K, Ross H.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onceptual models and scope.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mpact Assessment, New Orleans. 1997.

Bulmer M.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Bulmer M, Warwick D P, eds. Social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chester: Wiley, 1983.

Burdge R. A community guide to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Middleton, WI: Social Ecology Press, 1994.

Burdge R, Vanclay 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Vanclay F, Bronstein D A, eds.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Chichester: Wiley, 1995.

Clark C, Rosenzweig W, Long D, etc. Double bottom line project report: assessing social impact in double bottom line ventures. 2003.

Creighton J. An overview to the research conference on public involvement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Daneke G M, Garcia, Priscoli J, eds. Public involvement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3.

IAIA. Special Publication Series No.2. May 2003.

Momtaaz S. Institutionalizing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Bangladesh resource management: limit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05(25): 33-45.

Slootweg R, van Schooten M, Vanclay F. Function evaluation as a framework for integrating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Becker H, Vanclay F, Wolf C, eds.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advances in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Edward Elgar, 1999.

Taylor C N, Bryan C H, Goodrich C C. Social assessment: theory, process and techniques. New Zealand: Center for Resource Management, Lincoln University, 1990.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Committee on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May 1994.

Vanclay F. Summary of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for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Report to the closing session of the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mpact Assessment, Glasgow. 1999a.

Vanclay F. Social impact assessment. In: Petts J,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Vol. 1. Oxford: Blackwell Science, 1999b.

Yankelovich D. Coming to public judgment: making democracy work in a complex world. 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 Press, 1991.

JICA. JICA考虑环境与社会影响指导大纲. 2004.

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社会评价课题组, 编. 投资项目社会评价指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 国发[2004]20号文件.

孔令龙. 投资体制改革及对投资项目社会评价的要求. 中国工程咨询, 2004(8).

迈克尔·M·塞尼, 编著. 把人放在首位——投资项目社会分析, 王朝刚, 张小利, 等.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8.

潘岳. 战略环评与可持续发展. 人民网, 2005-08-28. <http://env.people.com.cn/GB/1072/3649409.html>

王朝刚, 李开孟. 投资项目社会评价专题讲座(系列). 中国工程咨询, 2004.

伍跃辉. 开展社会影响评价的SWOT分析. 环境科学与管理, 2005(4): 109-110.

向清. “项目社会评价方法”评介. 自然辩证法研究, 1997(6): 24-27.

徐莉, 柳瑞禹. 投资项目社会评价有关问题研究.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4): 33-35.

于晓刚. 澜沧江漫湾电站参与式社会影响评价. 自然之友, 2005-04-29.

袁方. 社会指标与社会发展评价. 北京: 中国劳动出版社, 1995.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中国投资项目社会评价指南.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04.

朱东恺. 投资项目社会评价探析. 中国工程咨询, 2004(7): 14-16.